

怨恨、认同与暴力 “伊斯兰国西非省”的生存策略与行为逻辑

怨恨、认同与暴力：“伊斯兰国西非省”的生存策略与行为逻辑^{*}

齐 赵 园 王 瑞 恒

内容提要 “伊斯兰国西非省”在尼日利亚及乍得湖周边地区展现出的强大韧性，其根源并非单纯的军事实力，而是该组织通过认同政治策略与地方社群建立的深刻联结。该组织精准把握并利用了地方民众因国家治理失效与边缘化而产生的普遍怨恨，并以此作为其动员的逻辑起点。与前身“博科圣地”奉行无差别暴力不同，“伊斯兰国西非省”提供庇护、司法等基础性公共服务，从而将自身塑造为温和穆斯林的保护者，并以此为界将政府及敌对派系建构为“他者”。在此基础上，其暴力活动呈现出高度的选择性，主要用于打击军事目标与清除异己，旨在巩固其作为“替代性治理者”的合法性，并强化社群认同与归属感。因此，有效的反制策略不能局限于军事清剿，必须追根溯源，通过改善地方治理、重塑民众信任，从而瓦解“伊斯兰国西非省”赖以生存的社会根基。

关键词 “伊斯兰国西非省” “博科圣地” 认同政治 恐怖主义

作者简介 齐赵园，西安外国语大学中亚·环里海研究中心、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教授（西安 710128）；王瑞恒，西安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硕士研究生（西安 710128）。

自2009年以来，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博尔诺州持续遭受大规模恐怖袭击，严重威胁乍得湖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其中，以“博科圣地”（Boko Haram）最

^{*}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国际涉华舆情研究与应对”（项目编号：2021ZX3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为活跃且最具破坏性，该组织曾被列为全球最致命的恐怖组织之一。^① 尽管尼日利亚政府军 2016 年几乎将其剿灭，但“博科圣地”残余势力通过与“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勾连再次复活并持续演化，使该地区重新成为全球恐怖主义动荡弧的关键节点。这一演变与 2010 年后“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区域权力重塑密切相关，恐怖主义借助北非动荡渗透至萨赫勒地区。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大量武器流散为萨赫勒地区恐怖势力迅速武装化提供了条件。^② 由于处在连接西非与中非的枢纽位置，乍得湖盆地在遏制极端主义向人口稠密的沿海与内陆地区扩散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这使其安全治理不仅成为非洲大陆反恐布局的重点，也持续吸引国际社会密切关注。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伊斯兰国西非省”（Islamic State's West Africa Province），该组织于 2016 年由“博科圣地”的核心力量与“伊斯兰国”势力融合而成。通过整合双方的人员、架构与意识形态，“伊斯兰国西非省”已发展成为乍得湖盆地极具威胁和“韧性”的极端组织。^③ 其活动不仅表现为频繁袭击军警及平民，还包括与其他极端组织复杂互动，严重冲击地区安全格局。然而，既有的反恐实践表明，常规军事打击难以有效根除这类恐怖组织，它们总能迅速重组资源、卷土重来，对国家及社会安全构成持续挑战。值得警惕的是，“伊斯兰国西非省”正不断在区域国家忽视的社群中扎根，其根基越深、历时越久，未来采取有效反制行动的难度也越大。

为从根源上破解反恐困局，亟须引入新的分析视角，解读恐怖主义的生成逻辑与演化路径。这不仅需要梳理和评估极端组织的行为模式，更应探究其背后的驱动机制，从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治理对策。已有研究指出，尼日利亚北部地区的社会认同具有宗教与族群高度捆绑的特征，几十年来各类政治势力对这两种认同肆意操纵，加剧族群关系恶化，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滋生提供土壤。^④ 有鉴于此，本文将引入认同政治的分析视角，剖析“伊斯兰国西非省”的行为逻辑，揭示其难以根除的深层社会原因，并结合当前反恐态势，探索有效的安全治理对策。

①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5: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2015 p. 41.

② 刘青建、方锦程 《非洲萨赫勒地带恐怖主义扩散问题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4 年第 11 期，第 27 页。

③ 宁彧、曾向红 《“博科圣地”的演进与扩散：原因和机制》，《中国非洲学刊》2021 年第 2 期，第 108 页。

④ 李捷 《极端主义组织与认同政治的建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4 期，第 103 页。

“伊斯兰国西非省”的产生演变与安全威胁

“伊斯兰国西非省”及其前身“博科圣地”的核心活动区域集中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乍得湖地区。该湖位于萨赫勒地区，处于乍得盆地中心，由乍得、尼日尔、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四国共享，是全球恐怖袭击事件发生频率最高的区域之一。乍得湖是周边逾三千万居民的生命线，维系着他们基本的生产生活，其水资源归属与分配问题长期以来引发区域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使该地区成为资源争夺与社会动荡交织的地带。^①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乍得湖面积不断缩小，进一步加大人口向湖区集中的压力和资源竞争的强度。复杂的地理环境与持续的社会矛盾叠加，为极端组织提供了理想的藏匿之所与活动空间。

（一）“伊斯兰国西非省”的产生演变

学界普遍认为萨赫勒地区极端主义泛滥源于多重因素叠加。政治层面，国家治理长期失效导致偏远地区出现权力真空；经济层面，该地区持续积贫积弱，人类发展指数全球垫底；社会层面，游牧与农耕社群的资源冲突、尖锐的民族政治斗争，以及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对立，共同为极端思想的传播创造条件。外部因素同样关键，中东地区强大的反恐压力，迫使“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将战略中心转向非洲，寻求新的扩张空间。这一复杂的地区背景催生并塑造了“博科圣地”及其衍生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崛起与演变。

1. “博科圣地”的全面极端化（2009—2015）

21世纪初，宗教激进分子穆罕默德·优素福（Mohammed Yusuf）在乍得湖地区以“反西方教育”为核心口号进行动员，并创立激进团体“博科圣地”，发起一系列暴力活动。2009年的迈杜古里暴动成为该团体演变的转折点，在此次冲突中，尼日利亚政府不仅处决了优素福，还造成逾千人死亡，使“博科圣地”遭受重创。“博科圣地”的残余势力在仇恨驱动下走向极端化，而且外部支持随之而来。2010年“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公开声援“博科圣地”，并宣称为其提供武器与训练。^②

① C. Nagarajan et al. *Climate-fragility Profile: Lake Chad Basin* Adelphi 2018 p. 32.

② “Al Qaida Makes Move on Troubled Nigeria,” UPI, June 17 2010 https://www.upi.com/Top_News/Special/2010/06/17/Al-Qaida-makes-a-move-on-troubled-Nigeria/79021276792262/ accessed June 12 2024.

2011 年，优素福曾经的副手阿布巴卡尔·谢考（Abubakar Shekau）接掌领导权，成为推动组织极端化的关键人物。他领导下的“博科圣地”开始频繁袭击联合国驻地、尼日利亚政府机构及反对其主张的穆斯林领袖。在随后两年间，其恐怖活动迅速蔓延至博尔诺州以外的地区，制造了包括约贝州首府袭击案、阿布贾天主教堂爆炸案和卡诺市袭击案在内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① 2014 年 4 月，该组织为报复尼日利亚政府的军事行动，在奇博克镇绑架了 219 名女学生，引发全世界关注。^② 直至 2015 年，尼日利亚军方发起大规模反击，迫使“博科圣地”主力撤退至萨姆比萨森林（Sambisa Forest）及格沃扎（Gwoza）以东山区。

2. “博科圣地”的复活与分裂（2015—2016）

在尼日利亚军方的强力打击下，“博科圣地”节节败退，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激化了早已存在的领导层冲突与意识形态分歧。为摆脱困境并整合内部分裂派系，谢考于 2015 年选择向“伊斯兰国”效忠，并将组织更名为“伊斯兰国西非省”。然而，这次效忠非但没能弥合内部分歧，反而使矛盾公开化。其根本原因在于谢考奉行的极端暴力路线与“伊斯兰国”核心的“建国”战略相悖：前者以滥杀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平民为特征，^③ 后者则更注重通过提供公共治理来争取民众支持。由于这一路线分歧，“伊斯兰国”高层开始公开质疑谢考的领导地位，并扶持组织内部温和派。冲突引爆点出现在 2016 年，“伊斯兰国”通过其官方媒体正式任命优素福之子阿布·巴纳维（Abu Musab al-Barnawi）为新任“瓦利”（省长）。这一举动成为双方关系的最终破裂点，促使谢考及其追随者正式脱离并组建独立的激进派系。自此，“博科圣地”的发展演变正式分裂为两条路线：受“伊斯兰国”支持的“西非省”转向相对温和的治理模式，而谢考派则延续了此前的无差别暴力。两派的意识形态鸿沟扩大最终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内部武装冲突。

3. “伊斯兰国”时期的演进（2016 年至今）

转型后的“伊斯兰国西非省”展现出较强的组织建设能力。在人员规模上，

① J. Peter Pham, “Boko Haram’s Evolving Treat,” *African Security Brief*, Vol. 20, 2012.

② “Bring Back Our Girls,” CNN, October 22, 2014, <http://www.cnn.com/2014/05/08/world/gallery/bring-back-our-girls-movement/>, accessed June 15, 2024. “As Many as 200 Girls Abducted by Boko Haram, Nigerian Officials Say,” CNN, April 16, 2014, <https://www.cnn.com/2014/04/15/world/africa/nigeria-girls-abducted>, accessed June 15, 2024.

③ 宁彧 《“博科圣地”的身份构成与策略选择》，《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 年第 5 期，第 136 页。

其武装力量持续壮大，到 2023 年初已近两万人^①，控制区内的平民数量也极为可观。^② 这种扩张依托的是成功的财政自立。自 2018 年起，“伊斯兰国西非省”便着手构建独立的经济体系，通过对控制区内农业、渔业和贸易活动实行系统征税，实现了财政高度自主，并逐步摆脱对“伊斯兰国”外部资金的依赖。^③ 为有效管理其人力和财力资源，“伊斯兰国西非省”还仿照国家模式，建立起复杂的行政架构，将控制区划分为多个“省”，并任命“瓦利”和“埃米尔”（军事指挥官）进行分治，从而奠定其作为“替代性治理者”的组织基础。^④

在巩固了内部实力后，“伊斯兰国西非省”将战略重心转向领地扩张，其最主要对手即为谢考派。由于双方控制区高度重叠且边界模糊，围绕资源和影响力的武装冲突愈演愈烈。这场内斗在 2021 年 5 月达到高潮，“伊斯兰国西非省”的突袭迫使谢考自杀身亡。^⑤ 然而，谢考之死并未让冲突终结，其残余部众在巴库拉·多罗（Bakura Doro）等新指挥官的整合下，迅速重组力量，并将活动重心转移至乍得湖岛屿地带，^⑥ 持续对“伊斯兰国西非省”发动报复性袭击，使两派的武装冲突延续至今。

（二）“伊斯兰国西非省”的安全威胁

从总体上看，“伊斯兰国西非省”已构成乍得湖地区最主要的安全威胁。据经济与和平研究所评估，该组织已连续数年被列为尼日利亚最致命的恐怖团体。尤其是自 2020 年以来，其行动强度与频率急剧攀升，年度袭击次数及伤亡人数均远超以往水平，表明其实质性威胁持续加剧。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国西非省”的暴力活动表现出高度选择性，其攻击主要指向敌对派系，而非平民。数据显示，在 2023 年由“伊斯兰国西非省”造成的死亡人员中，超过 60% 为敌对派

-
- ① Atta Barkindo, “Boko Haram-ISWAP and the Growing Footprint of Islamic State (IS) in Africa,” *Counter Terrorist Trends and Analyses*, Vol. 15, No. 2, 2023, p. 14.
- ② “After Shekau: Confronting Jihadists in Nigeria’s North East,”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March 29, 2022.
- ③ Atta Barkindo, “Boko Haram and Conflict Dynamics in the Lake Chad Region,” UNDP Borderland Research Centre, December 14, 2020.
- ④ Malik Samuel, “Islamic State Fortifies its Position in the Lake Chad Basi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July 13, 2021, <https://issafrica.org/iss-today/islamic-state-fortifies-its-position-in-the-lake-chad-basin>, accessed June 26, 2024.
- ⑤ “Boko Haram Leader Killed Himself Instantly by Detonating an Explosive, Rivals Claim,” Sky News, June 7, 2021, <https://news.sky.com/story/boko-haram-leader-abubakar-shekau-died-after-setting-off-explosive-while-being-chased-by-rivals-is-offshoot-claims-12326704>, accessed June 26, 2024.
- ⑥ “Conflict Analysis in the Lake Chad Basin 2020–2021: Trends,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p. 20.

系成员，这与谢考派的无差别攻击模式形成鲜明对比。^① 这种以“内部敌人”为主要打击目标的特点，揭示了评估“伊斯兰国西非省”威胁时的复杂性：它既是一个发动致命恐袭、割据一方的暴力实体，又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地方社群“保护者”的角色。

为精准评估“伊斯兰国西非省”的威胁，本文将构建一个包含“认知”与“能力”的分析框架。其中，认知维度是指公众和国家基于威胁发布者的历史行为与意图所形成的主观感知，这种感知是长期历史经验累积的结果。^② “伊斯兰国西非省”的威胁在认知层面被放大，关键在于其与“博科圣地”的历史渊源，后者曾给尼日利亚社会带来深重创伤。与这种主观感知相辅相成的是能力维度，它主要衡量行为体造成实质性损害的客观力量。对极端组织而言，其能力不仅体现在物理破坏的强度上，也体现在其利用“表演式暴力”进行宣传动员的效能上。因此，该组织在媒体和舆论场中制造影响的本领，同样是其综合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具体而言，“伊斯兰国西非省”的实力演变并非线性增长，而是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是蛰伏与巩固期。在分裂初期，该组织规模尚小，遵循“伊斯兰国”的指导采取“亲近民众”策略，避免大规模掠夺平民，通过精准绑架高价值目标来获取资源，在此期间活动频率和控制区基本保持稳定。第二阶段是扩张与扩散期。在积蓄充足资金和人员后，活跃度急剧攀升，并开始将袭击范围从博尔诺州大本营向尼日利亚中南部腹地乃至邻国喀麦隆扩散。^④ 这种地域扩张彰显其对自身实力的高度自信，并反映其谋求更大控制范围的战略意图。

综上所述，“伊斯兰国西非省”的威胁具有复合性特征。在能力层面，它已具备一定的军事规模和跨区域行动能力，足以主动制造并扩大危机；在认知层面，其与“博科圣地”的历史渊源在尼日利亚民众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恐惧烙印。这种威胁的顽固性源于其多元的动机、完备的组织架构和强大的生存韧性，并使其成为“伊斯兰国”全球网络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传播极端思想的关键棋子。更重要的是，“伊斯兰国西非省”的核心战略并非单纯诉诸暴力，而是通过在控

①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4: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p. 26.

② 余潇枫等《非传统安全概论：世界为什么不安全》（第三版·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6页。

③ 布莱恩·詹金斯（Brian Jenkins）认为恐怖袭击是一种“戏剧”，带有强烈的表演性质。参见 Alex Hobson, “A Lot of People Watching: Understanding the Theater of Terrorism,” *Diplomatic History*, Vol. 47, No. 4, 2023, p. 563.

④ Murtala Abdullahi, “ISWAP Claims Deadly Car Bomb Attack in Nigeria’s Kogi State,” *HumAngle*, January 3, 2023, <https://humanglemedia.com/iswap-claims-deadly-car-bomb-in-nigerias-kogi-state/>, accessed July 3, 2024.

制区内提供“替代性治理”，刻意塑造自身为“正义”与“秩序”的守护者，其最终目的是赢得民众认同，为长久割据与未来扩张奠定社会基础。

怨恨、认同与暴力：恐怖组织演化的动力学

认同是理解“伊斯兰国西非省”扩张机制的关键视角。此处的认同更确切地讲是认同政治，即基于特定集体认同所展开的政治动员与斗争。^① 作为社会运动的一种极端形态，恐怖主义的生成与发展，深度嵌入对集体认同的政治化塑造与建构之中。^② 认同本身具有“自下而上”的生成性与“自上而下”的建构性双重特征，它既可以源于社群成员共同经历所产生的共享情绪，也可以是组织为达成特定政治目的而塑造出的动员工具。

（一）自下而上视角

自下而上视角侧重于探究个体如何走向极端。其中的代表性理论是法萨利·莫哈达姆（Fathali M. Moghaddam）的恐怖主义阶梯理论。该理论将个体极端化描绘为一个逐级递进的过程：个体因感知到社会不公与相对剥夺，进而将怨恨指向特定“敌人”，随后在道德上接纳并合理化针对“敌人”的暴力，最终在思想和行动上完全融入恐怖组织。^③ 该理论清晰地刻画了个体心理的演变路径，但核心缺陷在于，它无法解释极端组织本身的起源与角色。在该理论中，激进组织仿佛是凭空出现的，被动地等待个体前来投靠，这忽视了组织在动员和塑造个体过程中的主动作用。

其他自下而上的理论模型，如强调框架对齐的社会认同理论或强调归属需求的美国联合军事信息支持中心（JMISC）模型也存在局限。^④ 它们倾向于将极端化归结为“绝望个体的理性选择”，却无法充分解答一系列关键问题，如极端意识形态从何而来？极端组织如何主动塑造吸引力？其动员机制究竟如何运作？以“伊斯兰国西非省”及其前身为例，它们在近二十年间持续迭代其意识形态叙事和宣传策略，这本身就是一种高度主动的组织行为。因此，要真正理解其韧性，还必须引入自上而下的组织视角，探究其作为动员者的策略与行为。

① Mary Bernstein, “Identity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25, pp. 47–74.

② 李捷 《极端主义组织与认同政治的建构》，第84页。

③ Fathali M. Moghaddam, “The Staircase to Terrorism: A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60, No. 2, 2005, pp. 161–169.

④ 美国联合军事信息支持中心（Joint Military Information Support Command）模型是由该中心从群体关系出发创建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二）自上而下视角

与之相对的自上而下视角则更关注组织等外部因素的作用。尼尔·约瑟夫·斯梅尔塞（Neil J. Smelser）的价值累加理论将集体行为的发生归因于结构性诱因、结构性怨恨、触发性事件、有效动员和社会控制等一系列因素的叠加。^① 该理论的贡献在于，它将有效动员和社会控制等组织层面的外部变量纳入分析。然而，其对有效动员的解释却存在循环论证的嫌疑，即它观察到某些动员手段取得成功，便将其定义为有效，却未能深入阐明这些手段为何有效。这暗示了动员成功并非组织的单向灌输，而是一个组织与受众之间双向选择的互动过程。

国内学者李捷的理论则更加聚焦极端组织自上而下的认同构建。该模型批判了西方理论过度强调个体选择，转而分析极端组织如何通过塑造认同边界、建构集体创伤和提供暴力解决方案这三大手段来主动实施认同政治。^② 这一视角有力地回答了动员为何有效的问题，揭示了极端组织的主动性和策略性。然而，无论是斯梅尔塞的宏观结构模型，还是侧重组织策略的认同构建模型，若单独用于分析“伊斯兰国西非省”的演进都存在不足。它们能够解释“博科圣地”的兴起，却难以解读其在 2015 年后复兴、分裂乃至内斗的复杂动态。单纯的自上而下视角容易忽视个体和社群层面的能动性 with 内在需求，即极端组织为何能与目标受众一拍即合。因此，若要整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视角，需要引入一个关键的社会心理中介变量，即深植于当地社会结构的“集体怨恨”。

（三）怨恨与认同

本文认为，集体怨恨是联结组织动员与个体选择的关键。社会怨恨最早由尼采提出，是一种无法利用自身行动做出直接反应，只能靠想象中的报复聊以慰藉的心理状态。^③ 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进一步指出，这种心理状态在社会经历从传统向现代的剧烈转型时尤为普遍，因为这是一场发生在“灵魂与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④。萨赫勒国家恰好处于此种充满阵痛的转型探索期：传统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受到冲击，而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又步履维艰，无法为民众提供稳定的身份归属与价值信念。发展滞后与治理失效使集体性的失落感与被剥夺感不断累积，最终发酵为普遍而深刻的社会怨恨。这为极端组织利用民众对现

①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4 页。

② 李捷《极端主义组织与认同政治的建构》，第 90 页。

③ [德]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 年版，第 21 页。

④ [德] 马克斯·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刘小枫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9 页。

有秩序的普遍不信任，进而推广其替代性认同方案提供了土壤。

基于怨恨与认同的互动关系，本文构建了一个组织演进模型。该模型认为，恐怖组织的发展大致会经历形成、稳定和扩散三个阶段，而贯穿并驱动这三个阶段演化的是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认同政治要素。在形成阶段，普遍的社会怨恨为外部极端思想渗入提供了契机，二者结合催生出新的极端组织。在稳定阶段，组织为提升凝聚力和吸引力，会着力进行内部建设，通过提供替代性治理来争取更多人员和物资支持。而在扩散阶段，羽翼丰满的组织则会寻求向外扩张以提升影响力，同时通过优化内部结构来应对扩张带来的挑战。驱动这一系列演变的具体要素，正是对怨恨的觉察与利用、对认同边界的塑造以及将暴力作为报复手段的策略。（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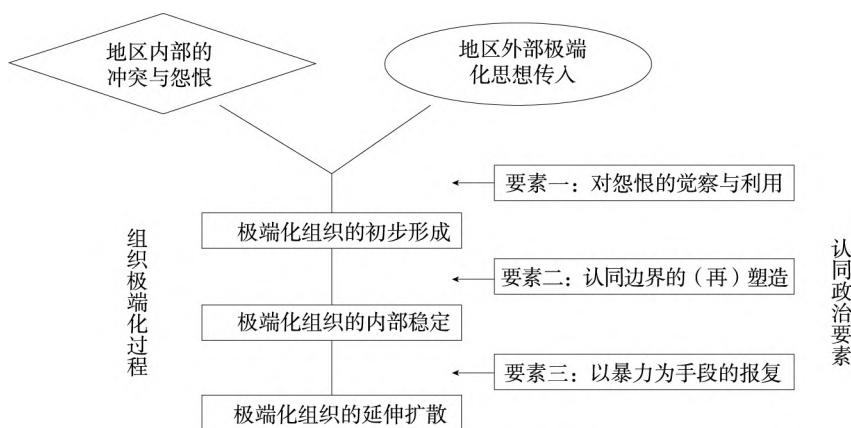


图 1 恐怖组织极端化过程与认同政治要素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阶段”与“要素”并非僵化的线性关系。极端组织与目标受众之间始终是一种双向选择的动态过程：极端组织必须不断根据受众的真实需求来调整和优化自身策略；而受众在被吸引和庇护的同时，也在思想和行为上被其意识形态渗透和改造。因此，“对怨恨的觉察与利用”“认同边界的再塑造”以及“以暴力为手段的报复”这三大要素，在恐怖组织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并非严格按顺序出现，而是常常同步发生、相互叠加、循环巩固。正是这种复杂的非线性互动，赋予恐怖组织以生存韧性和演化能力。

解构“伊斯兰国西非省”：怨恨、认同与暴力的实践

在具体实践中，“伊斯兰国西非省”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举措构建其认同政治。首先，“伊斯兰国西非省”确立自身替代性治理者的身份，通过建立行政

机构、提供治安与司法服务等方式，培育并赢得当地穆斯林社群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正是这些看似有效的治理举措，为“伊斯兰国西非省”在地方扎根并获取生存所需人力与物资提供可能。

（一）怨恨的察觉与利用

普遍怨恨源于特定群体遭受的相对剥夺，它根植于结构性不平等，是理解极端主义滋生、存续与扩散的心理基础。^① 在尼日利亚，催生这种集体怨恨的结构性因素是多重且相互交织的。在政治层面，国家长期深陷动乱，部族权力斗争与频繁的政治转型导致国家凝聚力缺失；政府公信力丧失、腐败与地方主义盛行，为极端组织崛起创造环境。^② 在宗教与身份认同层面，南北矛盾尤为突出，北方穆斯林虽然人口众多，但在国家政治舞台上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这催生出强烈的被排斥感。因此，即便政府采取宗教宽容政策，许多穆斯林仍难以认同由非穆斯林主导的世俗国家框架。^③ 对他们而言，全球化与世俗化进程不仅是外来性文化冲击，更被解读为对其信仰与身份的蔑视，^④ 由此产生的身份危机感与抗争情绪，为极端思想的渗透埋下伏笔。

尼日利亚南北经济发展的巨大鸿沟是该国结构性不平等的集中体现。进入 21 世纪，得益于南部石油开采与港口贸易，尼日利亚经济一度呈现高速增长态势。然而，这种增长并未惠及全体人民，产业结构单一、工业基础薄弱等问题使发展成果高度集中于南方，因此南北差距、城乡差距持续拉大，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尤为严峻，失业率与贫困率居高不下。^⑤ 以“博科圣地”策源地博尔诺州为例，其民生状况尤为严峻：新生儿死亡率高达六成，近七成人口日均生活费不足 1 美元，人均预期寿命仅 46 岁，堪称全国最不发达地区之一。^⑥ 这种在国家整体增长背景下被“无情抛下”的相对剥夺感，为当地大量走投无路的失业青年和底层民众倒向极端组织，提供了最直接的社会经济动因。

“伊斯兰国西非省”的前身“博科圣地”正是在 2015 年遭受重创、陷入低

① 胡雨 《社会运动理论视角下的政治伊斯兰生成机制》，《国际论坛》2009 年第 3 期，第 7—8 页。

② 宁彧 《尼日利亚“博科圣地”问题研究》，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 年，第 22—23 页。

③ Toyin Falola *Violence in Nigeria: The Crisis of Religious Politics and Secular Ideologies*,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1998, pp. 126–127.

④ 周明、曾向红 《恐怖主义的最新演变及其理论解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5 页。

⑤ 宁彧 《尼日利亚“博科圣地”问题研究》，第 25 页。

⑥ 数据来源：<https://nigeria.opendataforafrica.org/>, accessed January 8 2025.

谷后，开始更具策略性地利用集体怨恨来寻求“重生”。^①它准确捕捉到民众怨恨并未限于经济层面，更包含强烈的政治诉求。因此，当它选择与“伊斯兰国”结盟时，其核心策略便是承诺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法为核心的“国家”（Dawla）。这一承诺也回应了穆斯林社群长期以来脱离尼日利亚世俗国家的政治期盼，并与全球“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建国”号召相契合。“伊斯兰国西非省”正通过不断描绘高度理想化的“替代性国家”蓝图，将民众弥漫的怨恨情绪系统性转化为对组织的政治认同与信任。

（二）认同边界的再塑与稳固

认同边界的塑造与强化是极端主义以认同政治煽动和推进极端化的重要过程，通常包括自我与他者的塑造及满足内群体偏好。^②“博科圣地”曾借萨拉菲极端主义叙事，将“穆斯林和圣战分子组成的伊斯兰信仰阵营”与“一切不信道者”区分开来，“自我”与“他者”呈对立关系。其策略的核心是运用塔克菲尔（Takfir）原则，单方面宣布其他穆斯林（特别是温和派）为叛教者或不信道者，从而为针对他们的暴力袭击乃至屠杀提供神学上的合法性。^③谢考派就采取这一叙事，其内在逻辑是通过将“外群体”描绘为一切问题的根源，来巩固“内群体”的凝聚力，从而证明其暴力行为的正当性。

“伊斯兰国西非省”与谢考派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体现在对待普通穆斯林的态度上。“伊斯兰国西非省”刻意与其前身滥杀无辜的行为切割，领导人巴纳维在接受“伊斯兰国”官方媒体采访时明确宣称“任何皈依伊斯兰教，且没有任何违反伊斯兰教教义行为的人，都不能被称为不信道者，更不能成为革除的对象。”^④这一表态实质上否定了谢考派奉行的将温和派穆斯林随意开除教籍并视为合法攻击目标的极端做法。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切割，不仅仅是理论分歧，更是一种争夺民心、服务派系斗争的政治策略。为此，“伊斯兰国西非省”频繁利用其宣传渠道，将谢考描绘为一名腐败、独裁且道德败坏的领导者，^⑤以此从理论和

① 宁彧、曾向红 《“博科圣地”的演进与扩散：原因和机制》，《中国非洲学刊》2021年第2期，第100页。

② 李捷 《极端主义组织与认同政治的建构》，第92—93页。

③ Anwar Al-Awlaki, “Battle of the Hearts and Minds,” 2008, p. 8, <https://www.halaltube.com/the-battle-of-the-hearts-and-minds>, accessed January 12, 2025.

④ Alex Thurston, “Abu Musab al-Barnawi’s Interview with the Islamic State’s al-Naba’ Magazine,” *Journal of Islamic Studies*, Vol. 36, No. 1, 2017, pp. 257–275.

⑤ Aymenn Jawad Al-Tamimi, “ISWAP vs. Abu Bakr Shekau: Full Text,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August 5, 2018, p. 6, <https://www.aymennjawad.org/21467/the-islamic-state-west-africa-province-vs-abu>, accessed January 12, 2025.

道义两个层面，全方位地瓦解他的合法性，争夺“博科圣地”的正统继承权。

在对待其主要外群体谢考派时，“伊斯兰国西非省”的策略由相对克制转向全面进攻。在 2020 年之前，双方虽有摩擦但未爆发大规模冲突。然而，在内外条件成熟后，“伊斯兰国西非省”主动发起对谢考派的全面进攻。这一转变背后有多重战略动机：其一，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通过军事胜利证明其路线优于谢考派；其二，巩固治理合法性，通过清除对平民构成威胁的谢考派，兑现其作为“保护者”的承诺，从而稳固自身地位；其三，提升国际影响力，打击谢考这一国际公认的恐怖分子头目，有助于其在全球“圣战”体系内获得更高声望。同时，现实的物质利益也驱动其行为，吞并谢考派的控制区意味着获取更多人口与税收资源，并因此可能获得“伊斯兰国”更多的财政与物质支持。

在对待内群体时，“伊斯兰国西非省”则致力于通过提供“替代性治理”，稳固认同根基。该组织推行旨在赢取民众支持的治理方针，通过宣传营造出一种在其治下生活更便利、更有序的景象。^①更重要的是，它将这种宣传落实到具体的治理实践中，从调解村民纠纷、惩治偷盗等基础治安服务，到解决农牧冲突、发放贷款等更复杂的经济社会管理，试图在所有层面证明其治理能力优于腐败失效的世俗政府。当接管原谢考派控制区后，更是迅速在当地建立起一整套涵盖税收、司法及警卫的行政体系。通过这些手段，“伊斯兰国西非省”将自身塑造为社会秩序的提供者，从而增强统治合法性与当地民众的接纳度。这种深度嵌入地方社会的治理模式，使其意识形态得以向更广泛的人口渗透，也为尼日利亚政府的反恐与重建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三）以暴力为手段的报复

在完成“我们”与“他们”的边界划分后，暴力便成为极端组织用以维系认同、实现政治诉求的关键手段。从意识形态来看，任何外群体皆为敌人，可施以极端暴力。从动员逻辑来看，当一个社群长期感到被边缘化，并将其困境归咎于诸如西方世俗主义侵蚀之类的外部压迫时，暴力就很容易被包装成一种争取承认、寻求报复的正当途径。因此，在“伊斯兰国西非省”的认同政治实践中，暴力并非单纯的破坏，它既是向追随者提供的终极解决方案，也是巩固认同边界、确保内部忠诚的最终保障。

参照有关伊斯兰极端主义叙事战略的研究，极端组织行动目标通常包含三个层面：抵抗以美国及其盟友为代表的外部入侵者，攻击其所在国政府，以及重建

^① “After Shekau: Confronting Jihadists in Nigeria’s North East,”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March 29, 2022.

哈里发国。在萨赫勒地区，目前极端组织的绝大多数行动都集中于攻击本国政府，“伊斯兰国西非省”同样如此，但其特殊之处在于将暴力行动与治理议程紧密结合，并根据自身发展阶段灵活调整。在2016—2017年的初期阶段，该组织的袭击频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自2018年起其活跃度显著提升，2020—2023年更是激增至年均三百余起。^①

“伊斯兰国西非省”暴力活动的急剧升级，揭示了认同与暴力的共生关系，可以从两个相互关联的角度来理解。一方面可视为“以认同驱动暴力”，2020年后该组织的内部治理与社群认同已达到较稳固的程度，使其有足够的力量向外部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另一方面可视为“以暴力驱动认同”，即组织需要通过更频繁、更剧烈的暴力行动，不断强化“我们—他们”的对立叙事，回应追随者的复仇心理，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认同基础。这两种逻辑共同构成“伊斯兰国西非省”在扩张过程中独特的演化动力。

“伊斯兰国西非省”的暴力策略还呈现出高度的平衡与分化，针对不同对象采取截然不同的手段。在对外反抗方面，它采取灵活的非对称战术，如设置路障伏击、使用简易爆炸装置攻击军警车队、袭击军事哨所等，旨在持续削弱政府力量，同时避免因大规模正面攻击而招致毁灭性空袭。值得注意的是，该组织在发动自杀式袭击时刻意避免使用妇孺，以维持其道义形象。而在内部治理中，暴力则被包装在“司法”的外衣下。尽管“伊斯兰国西非省”大体上避免对平民实施无差别恐吓，但对其认定的“不当行为者”，如不遵守其教法、被怀疑与政府合作或拒绝纳税的民众，会通过其设立的教法法庭进行严酷惩罚，乃至公开处决。^②在对待其主要竞争对手谢考派时，持续的暴力攻击被赋予双重合法性：既是清除异端、保护治下民众免受谢考派劫掠的“正义之举”，也是为追随者提供一个清晰的、制度化的暴力复仇渠道。

从清剿到治理：乍得湖地区反恐范式转型

“伊斯兰国西非省”之所以难以根除，并非由于其军事上不可战胜，而根本上源于其政治策略的成功。该组织娴熟地运用认同政治，将地方治理的长期失败和民众中弥散的怨恨情绪有效转化为自身作为“替代性治理者”的合法性根基。这种以争夺民心为核心的扩张模式，解释了为何传统的军事清剿手段在乍得湖地

① 数据来源：<https://www.jihadanalytics.com/>，accessed January 17 2025.

② “After Shekau: Confronting Jihadists in Nigeria’s North East,”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March 29 2022.

区屡屡失灵，甚至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因此，任何有效的应对之策都必须超越单纯的武力对抗，回归对地区安全格局的重新审视和治理路径的根本性探索。

（一）乍得湖地区安全困境与新变化

2015 年，尼日利亚新任总统穆罕默德·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上台后，曾以强硬的军事手段对“博科圣地”发起全面打击。通过重振以多国联合反恐部队（Multinational Joint Task Force, MNJTF）为主的区域合作，并辅以大规模的装备采购与军事行动，尼日利亚政府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① 在联合部队的高压攻势下，“博科圣地”遭受重创，不仅丧失了包括萨姆比萨森林在内的多个核心据点，还有数百名成员投降。^② 这次军事行动直接促成该组织的内部分裂，并在随后几年里有效遏制了恐怖袭击的频率，一度让外界看到危局的转机。

然而，这种基于传统军事优势的成功是短暂的。随着“伊斯兰国西非省”这一新实体的崛起，乍得湖地区安全局势再度陷入动荡。与前身不同，“伊斯兰国西非省”的核心策略是经营与平民的关系并深度融入地方社群，这使传统的军事占领和定点清除战术效果大打折扣。联合反恐部队虽然能够攻占和控制城镇据点，却始终难以在广袤的农村地区建立稳固而长期的存在。“伊斯兰国西非省”正是利用政府军在乡村地带留下的治理真空，通过独特的认同政治策略，牢牢掌控人心与土地，从而有效消解政府军事打击的成果。

尼日利亚及其合作伙伴虽然多次尝试突破困境，却始终难以复制 2015 年的成功，其反恐战略在多个层面暴露出局限性。首先，军事策略本身存在缺陷。例如，尼日利亚军方推行的“超级营地”战略，虽然通过集中兵力减少了军事损失，却以放弃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控制为代价，反而为“伊斯兰国西非省”等组织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其次，区域合作机制脆弱且缺乏协调。2020 年乍得发动“波霍马之怒”（Colère de Bohoma）行动取得战术性胜利，时任总统代比却因不满其他合作国缺乏协同而险些退出联盟，^③ 这凸显了多国联合反恐部队的内

① “Boko Haram: Buhari Approves Release of \$1bn for Security Equipment,” <https://punchng.com/> accessed January 17, 2025; Alexander Thurston, *Boko Haram: The History of an African Jihadist Move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239.

② IANS, “Over 200 Boko Haram Militants Surrender in Nigeria,” Yahoo, September 25, 2015, <https://in.news.yahoo.com/over-200-boko-haram-militants-surrender-nigeria-153609173.html> accessed July 8, 2024.

③ “Tchad : Face aux djihadistes les coups de colère de com’ et de bluff du président Idriss Déby,” *Le Monde*, 16 April 2020, https://www.lemonde.fr/afrique/article/2020/04/16/tchad-face-aux-djihadistes-les-coups-de-colere-de-com-et-de-bluff-du-president-idriss-deby_6036841_3212.html accessed July 8, 2024.

部矛盾。近年来尼日尔等国相继退出，更使这一区域联盟的前景蒙上阴影。最后，非军事手段同样收效甚微。无论是旨在恢复国家权威的稳定计划，还是意图转化前谢考派成员的收编行动，都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局势。各类行动收效不彰，恐怖组织的活动并未受到实质性削弱。

地区反恐行动之所以陷入越反越恐的困境，根源不仅在于对手的策略，更在于反恐主体自身内在失调。一方面，反恐合作机制失序。作为核心合作平台的多国联合反恐特遣部队，由于成员国之间贡献与回报不均而长期争执不断，导致行动步调不一，难以形成可持续的战略协同。许多军事行动仅是应对突发危机的短视反应，缺乏长远规划与共同目标。^① 另一方面，反恐衡量标准与动机出现偏差。治理成效往往被简化为“消灭恐怖分子的数量”这一单一指标，忽略了更为根本的社会稳定与发展。同时，反恐行动也时常沦为当权者博取短期政绩的工具，缺乏持久的政治意愿。更为致命的是，反恐行动中的人权侵害行为正不断摧毁其合法性基础。诸如军事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等事件，^② 极大地疏远了当地民众，损害了政府与军队公信力。这些行为非但无助于反恐，反而将更多对政府失望的民众推向极端组织的怀抱。

近年来，外部地缘政治剧变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困境。以美国和法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因反恐行动成效不彰且干预政策普遍被批评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而反应强烈，^③ 最终在多国政变的背景下相继从尼日尔等国撤军。西方撤离在萨赫勒地带制造了巨大的“安全真空”，直接导致布基纳法索、马里等国的恐怖主义活动急剧增加，^④ 并通过“动荡弧”效应，对乍得湖盆地的“博科圣地”系组织形成危险的“反哺”之势，给区域安全带来连锁冲击。

与此同时，俄罗斯正依托其“非洲军团”迅速填补这一权力空白，与萨赫勒及周边国家展开差异化的安全与经济合作。由于较少受困于后殖民主义的历史叙事，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西方国家面临的本土抵触情绪。然而，俄罗斯介入也带来新的复杂性。短期来看，其强势存在可能冲击既有的区域反恐合作框

① “What Role for the Multinational Joint Task Force in Fighting Boko Haram?”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July 7, 2020, <https://www.crisisgroup.org/africa/west-africa/291-what-role-multinational-joint-task-force-fighting-boko-haram>, accessed July 8, 2024.

② “Nigerian Air Force Bombardments Have in its Wake Civilian Casualties: Is There an End in Sight?” Humangle, May 3, 2022, <https://humanglemedia.com/nigerian-air-force-bombardments-have-in-its-wake-civilian-casualties-is-there-an-end-in-sight/>, accessed July 8, 2024.

③ “Democracy vs. Security: The Sahel’s Geopolitical Realignment,” Vision of Humanity, September 2024, <https://www.visionofhumanity.org/democracy-vs-security-the-sahels-geopolitical-realignment/>, accessed October 15, 2024.

④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5: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p. 21.

架；长期来看，其成效仍是未知数。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单纯的军事路径无法根除恐怖主义。因此，俄罗斯的新角色能否真正促进地区稳定，最终取决于它是否愿意并能够超越传统的军事援助模式，转向支持一种融合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治理方案。

（二）乍得湖地区治理路径探索

任何旨在实现乍得湖地区长治久安的有效方略，都必须超越单一的军事维度，仅有硬件层面的武力清剿远远不够，还必须在软件层面，即观念、认同与社会治理上同步发力。因此，一种结合直接军事干预与间接社会调控的复合型治理路径成为应对当前困局的必然选择。

首先，直接的军事手段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保障。军事打击的核心目标在于持续对极端组织施加压力，压缩其活动空间，切断其人员与物资的补给线，防止其威胁进一步规模化。为此，区域国家应致力于：一是强化区域军事合作，巩固并提升反恐行动的效率与协同能力；二是加强边境联合管控，特别是与尼日尔等国的边境地带，以阻断极端分子的跨境流动；三是深化国际反恐合作，在情报共享、人员培训等领域积极寻求与经验丰富的域外大国合作，提升整体反恐效能。同时，也可通过策略性手段在外部形成围困态势，加大“伊斯兰国西非省”与敌对派系之间的内部消耗。

其次，仅有军事手段远不足以根除恐怖主义，间接的社会治理才是破解越反越恐困局的根本之道。如前文所述，“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韧性根植于其对社会怨恨情绪的成功利用，因此，反恐的最终目标必须转向消除催生怨恨的土壤。这要求将安全观念从传统的国家安全转向人的安全，即保障民众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的基本权利。若无视这一点，强硬的军事手段反而会加剧当地社群的危机感与对立情绪，进一步将他们推向极端组织，从而使反恐行动适得其反。

具体而言，尼日利亚政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在经济社会层面，着力缩小南北差距，加大对博尔诺州等东北部地区的投入，完善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当地青年提供切实的发展机会，从物质层面瓦解社会怨恨的基础。在政治与法律层面，致力于良政善治，坚决铲除腐败，完善司法体系，在所有行动中严格尊重人权、遵守法制，以重建政府公信力。在国家认同层面，需要以长远眼光，持续努力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国家认同，以弥合族群与宗教裂痕。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却是实现地区长久和平的必由之路。

余 论

“伊斯兰国西非省”在乍得湖地区的演进，揭示了当代恐怖组织如何超越单纯的暴力破坏，转而寻求一种更具韧性的生存与扩张模式。本文的核心论点在于，“伊斯兰国西非省”的成功并非军事层面的胜利，而是其娴熟运用认同政治的结果。研究发现，该组织以地方社群因国家治理失败而产生的普遍怨恨为动员起点，通过提供基础性的公共服务和司法裁决，成功将自己塑造为秩序的提供者与温和穆斯林的保护者。在此基础上，其暴力行为变得高度选择性，主要用于巩固治理、清除异己，从而不断强化其作为替代性治理者的合法性，构建起一种强大而排他的集体认同。

本研究的意义体现在两个层面。在理论上，它验证了将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认同视角引入恐怖主义研究的有效性，并提出一个以“怨恨”为桥梁，联结组织自上而下的策略建构与社群自下而上的心理需求的分析框架，为理解类似组织的演化过程提供新的理论工具。在现实政策层面，本研究的结论表明，针对“伊斯兰国西非省”这类组织的斗争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治理权与合法性的政治竞争，而非单纯的军事对抗。任何忽略地方治理、无视民众诉求的反恐策略都无异于缘木求鱼，甚至会因其自身暴力与失序反向巩固极端组织的认同根基。

当然，本研究亦存在进一步深化之处。例如，受限于资料，本文更多是基于对组织行为的外部观察，未来研究可尝试通过更深入的田野调查，从微观层面探究地方民众对“伊斯兰国西非省”复杂矛盾的真实心态。此外，乍得湖乃至整个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局势，正日益受到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变迁的深刻影响。结合组织内部逻辑的分析与更宏观的国际关系研究，探究内外因素如何交织互动以共同塑造地区安全，将是一个极具价值的后续研究方向。归根结底，“伊斯兰国西非省”的挑战是对陷入困境的后殖民国家构建有效、包容性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

（责任编辑：贺杨）

half-century. Today, amid heightened political instability, terrorism and economic distress, migration in West Africa has evolved into a severe hybrid challenge combining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dimensions. The governance dilemma stems not from a single cause but from complex multi-level games involving internation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actors. Internationally, external forces, especially the EU, prioritize their security interests through fragmented bilateral cooperation, undermining regional coherence. Regionally, ECOWAS struggles with institutional overlap and legitimacy crises, reducing its authority and effectiveness. Nationally, member states vacillate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due to sovereignty concerns and domestic pressures, lacking both the political will and institutional capacity to align regional commitments with consistent action. This multi-layered game places governance actors in a dual dilemma: “regional development versus national interest” and “regional freedom versus national security”, forming a structural deadlock in West African migration governance.

Keywords: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immigration governance, multiple game, regional integration

Authors: Cao Yuan,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Academy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ai Weiyu,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Academy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Resentment, Identity and Violence: The Survival Strategy and Behavioral Logic of Islamic State's West Africa Province

Qi Zhaoyuan and Wang Ruiheng

Abstract: The resilience demonstrated by the Islamic State's West Africa province in Nigeria and the Lake Chad region stems not merely from military powers but from the profound connections it has established with local communities through identity-based political strategies. It adeptly exploits the pervasive grievances among the populace, which are rooted in state failure and systemic marginalization, as the foundational logic for its mobilization efforts. Unlike its predecessor, Boko Haram, which employed

indiscriminate violence ,Islamic State’ s West Africa Province provides basic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protection and justice ,thereby positioning itself as a protector of moderate Muslims while framing the government and rival factions as the “other”. Consequently ,its use of violence is highly selective ,primarily targeting military objectives and eliminating opponents to consolidate its legitimacy as an “alternative governance authority ” and reinforce community identity and belonging. Therefore ,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must extend beyond military operations to address the root causes of this phenomenon. By improving local governance and rebuilding public trust ,it is possible to dismantle the social foundations upon which the organization depends.

Keywords: Islamic State’ s West Africa Province , Boko Haram , identity politics ,terrorism

Authors: Qi Zhaoyu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enter for Studies o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spian Rim ,Xi’ 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 an 710128) ; Wang Ruiheng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School of European Studies ,Xi’ 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 an 710128) .